

儒家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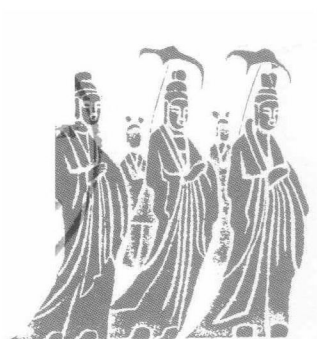


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

李玉良 罗公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儒家思想



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

李玉良 罗公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家思想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 / 李玉良 罗公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004-7968-0

I. 儒… II. ①李…②罗… III. 儒家-哲学思想-
英语-翻译-研究 IV. B222.05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8838 号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山东省社会科学 规划研究项目文丛》编委会

主任委员 李 群

副主任委员 张全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成 尹慧敏 齐 涛

刘德龙 安世银 张 华

蒿 峰 颜世元

前 言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数千年来，以非凡的精神力量把中华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命脉与灵魂。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历经世代儒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仅为中华民族，而且为整个世界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在全世界面临诸多危机的今天，我们不禁想到了儒家思想及其传播，尤其是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问题。这一问题与历史上儒家经典在西方的翻译及其影响密切相关。

16 世纪以来，为了让西方以教皇领导的各宗教集团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同天主教义理的相通之处，以便获得教会支持，使他们能在中国实行“合儒”传教的策略，西方传教士把《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等多种文字。西方汉学家为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大量翻译儒家经典著作。遗憾的是，无论传教士还是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翻译，都没能够完全准确地传达儒学精神。纵观各个时期的翻译文本就会发现，有意和无意的歪曲和舛误十分普遍。这些译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媒介的作用——使西方人了解了部分儒家思想，并引起了他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与此同时，这些译本也误导了西方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对儒家思想的传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对此，我国文化界和翻译界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些研究者认为西方译者的翻译十分忠实可靠，甚至将其奉为译事圭臬。然而，这些翻译文本对现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西方民众

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是否符合儒学的本来面目？应该如何对待儒学思想在翻译与传播过程中的异化问题？如何翻译儒家经典，把完整的儒家思想呈现给西方？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细致的思考和研究。

本书作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06JDB106）的研究成果，力图以《大学》、《孟子》、《论语》、《中庸》、《荀子》等五部儒家经典的英文翻译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文化、哲学等方面进行考察，并选取其中的章句译文进行比较分析，以发现其中的舛误及其成因；以“仁、义、礼、忠、孝、君子”等核心概念为重点，考察西方译者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与儒家思想本义的差距；从历史文化和传播的角度，研究儒家思想向西方传播的方式、途径和效果；结合对英美国家民众基本儒学知识所开展的问卷调查，分析儒家思想在西方民众意识中的地位和影响；在总结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儒家思想的翻译与传播战略。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力求突出三个特点：一是，系统考察儒家经典的翻译状况，包括考察儒家思想西传过程中发生的人为歪曲和舛误，并研究其所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从而认清中国儒家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其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状况，为采取纠正措施以促进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健康传播奠定基础。二是，多视角考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状况。一方面，系统总结自16世纪西方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著述以来直到当今美国“波士顿儒家”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考察从西方传教士、早期汉学家、华裔学者到现代中国儒学界、各类媒体和孔子学院等多种渠道对儒家思想的传播状况。三是，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在英美等国开展社会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和统计分析，从而了解西方社会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接受的广度、深度和准确度，由此获取第一手资料，为分析儒家思想在西

方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未来儒家思想的翻译与传播战略，提供有效借鉴。

课题研究前后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书也耗时数月，过程倍感艰辛，结果尚可慰怀。除了作者的工作外，另外几位同志也参与了部分研究工作，并提供了部分章节的初稿，他们是康宁、刘强、于巧峰、车云宁、段晓茜、公文。

本书在付梓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并在社会调查期间得到了中国海洋大学孙立新副教授，青岛科技大学吕耀中副教授，张煜副教授，方洁副教授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尽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条件所限，书中涉及的部分研究工作做得仍不够完备，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作者

2009年3月于青岛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5)
第二节 儒家思想翻译与传播的研究意义	(12)
第二章 儒家思想源流	(17)
第一节 儒家思想概述	(17)
一 “仁爱”之学	(18)
二 “性善”与“仁政”	(22)
三 “性恶”与“礼”	(28)
第二节 儒家思想的发展	(34)
一 天人感应	(34)
二 “理学”、“新儒学”、“当代大众儒学”	(37)
第三章 儒学经典翻译研究	(42)
第一节 《大学》翻译例析	(43)
第二节 《中庸》翻译例析	(70)
第三节 《论语》翻译例析	(84)
第四节 《孟子》翻译例析	(106)
第五节 《荀子》翻译例析	(151)
第四章 儒学核心概念翻译考析	(180)
第一节 “仁”的翻译	(180)
第二节 “义”的翻译	(194)

第三节	“礼”的翻译	(203)
第四节	“忠”的翻译	(215)
第五节	“孝”的翻译	(223)
第六节	“君子”的翻译	(227)
第五章	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237)
第一节	19 世纪末以前西方传教士与汉学家 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237)
第二节	20 世纪以来西方汉学家的儒学研究	(269)
第三节	20 世纪以来中国儒学界对儒家思想的 海外传播	(291)
第四节	海外华人的儒学研究 with 传播	(298)
第五节	网络及其他媒体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304)
第六节	孔子学院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322)
第七节	儒家思想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影响	(326)
第六章	未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战略	(333)
第一节	翻译与跨文化传播	(333)
第二节	未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翻译	(337)
第三节	未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345)
参考文献		(364)

第一章 绪论

人心惟危，道心为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一个国家必有一独特文化，一独特文化必有一核心；有核心，则有栋梁；有栋梁，则有定力；有定力，民则康泰；民康泰，则国长存。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栋梁是儒家文化。自孔子以来，儒家思想经世代儒家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仅为中华民族，而且为整个世界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数千年来，它以非凡的精神力量把中华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命脉与灵魂。

优秀文化属于全人类。16 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传教士东进的脚步，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正式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四个世纪以来，两种文化的交流过程充满了坎坷与沉浮，相互之间有融合，也有排斥与碰撞。自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之初至今，总的来说，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传教士和汉学家的著述，二是传教士和汉学家的翻译，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西文化之间通过多种渠道开展的交流。随着时间的延续，儒家思想西传的广度不断拓展，深度不断加大，从而逐渐影响了世界。

第一种类型以儒家思想同天主教教义的碰撞、对话与互诠整合为基本特征。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利用分为三种方式，一是窃用儒学名词诠释天主教的名词，如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把

含义深广的“仁”（爱人）与天主教的“爱”（爱天主）等同起来。二是引述《论语》、《诗经》等儒家经典中圣人的事迹佐证天主教教义。例如，白晋用西方神学里关于神灵启示的古老的“秘义说”（Hermetism）阐释《诗经》中的诗句，称圣子耶稣诞生的秘密也见之于《诗经·大雅·生民》。白晋把《诗经》中的人与《圣经》中的神相类比，说诗中的“姜原”就是圣母玛丽亚，“后稷”就是耶稣基督，这首诗记载了她出门做祭祀时，在天神（姜原的丈夫）的感召下，踩了他的足迹，令神进入其体而怀上后稷的过程；而《圣经》也记载了耶稣如何在冬季奇迹般地诞生，以及第一次尝到人间痛苦时失声啼哭等情景。三是引述儒家经典中的章句来佐证天主教义理。如用“世有哲王，三世在天”^①来佐证天主教有神灵意志的“天堂”的存在^②，从而把天主教的唯一神宙斯（Deus）和我国先民神祇观念中的“天”、“上帝”等同起来^③。传教士的著述，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注释基督教教义的过程。在此相互阐释的过程中儒学伦理思想和天主教神学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交汇。当然，这种交流并不是目的性的，而是策略性的，是传教士们为了使中国民众容易接受天主教教义而采取了“合儒”的传教策略，因此这种交流也可以说成是西方传教士在试图向中国民众传播天主教教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副作用。西方汉学家的著述则与传教士不同，其动机不再是神学研究，而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历史文化学、社会学、哲学等研究。例如，英国汉学家修中诚（E. R. Hughes）的《中国古代哲学》，美国汉学家南乐山（Robert Cum-

① 《诗经·大雅·下武》。

② 利玛窦：《天主实义》第六篇。

③ 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mings Neville) 的《波士顿儒学》^①，当代美国汉学家安乐哲 (Roger T. Ames) 的《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孔子哲学思微》等，就属于儒学哲学研究。这些论著在内容上不像传教士那样牵强附会，而是客观和全面得多。

第二种类型以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儒家经典著作作为基本特征。16 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把《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以及其他各种文字。例如，利玛窦翻译了论语的部分章句，名为《孔子的伦理：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主和救星耶稣基督降生五百年以前就已达思想巅峰的中国哲学家，其教导至今仍为中华民族奉为最佳人生指南》(*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传教士翻译儒家经典的目的并非出于纯粹个人兴趣，亦非出于对儒家思想的衷心认同，而是出于宗教目的。他们这样做，不外乎是让西方以教皇领导的各宗教集团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同天主教义理的相通之处，以便获得教会的支持，使他们能在中国实行“合儒”传教策略。

汉学家翻译儒家经典与传教士不同，他们更注重学术研究。如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 (Arthur Waley) 由于其翻译活动正处在西方文化人类学发展如火如荼的时期，因此受人类学方法论的影响较大，其译文明显带有人类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特征，并出现了一些偏差。再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 的《诗经》英文译本学术性则更加突出。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往日经济落后的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逐步崛起，吸引了西方研究者的目光，世界各地

^① Boston Confucianism. SUNY, 2000.

中国学迅速发展，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较以前人数大增，研究范围日广，成果日丰。例如，在美国，“波士顿儒家”就是一支享誉全球的研究力量，成就卓著。

近年来，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增加了两个新的渠道，其中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孔子学院。根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3月，已经启动建设了238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6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的孔子学院已经建了四所，而且孔子学院在全球正不断升温，规模不断扩大。^① 这些学院旨在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儒学传播当然是其主要内容之一。这一传播渠道无疑有助于加快儒家思想传播速度，有利于把儒家思想更准确和全面地传播到西方社会中去。

另一个传播渠道是互联网。目前国内外已经建立了数十个网站，设置网上论坛，就儒学问题进行研究或者结合时代需要对儒学内涵进行现代阐释。国内有些国学网站的网上论坛，学术气氛很活跃，有的网站学术争论的稿件一天就能交流近千篇。有的网站同时设有英文版本，把儒学研究新成果同时传递给世界各地的读者。国外有些汉学或儒学研究机构也设置自己的网站，发布研究成果，推动学术交流，还有的网站则登载儒家经典的西文译本。这些网站对传播儒家思想文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16世纪以来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在近400年的历史中，对翻译和著述总体效果本身的研究情况如何呢？据考察，儒家经典在翻译的过程中，有许多人为的歪曲和舛误。发生这些歪曲和舛误的原因、方式、程度及其影响是什么？现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儒家伦理究竟是什么？他们对中国儒家伦理的认识和理解是否

^① 见 www.hanban.edu.cn/cn_hanban/kzxy.php。

符合本来面目?美国著名儒学研究者杜维明曾说,一种思想,一种文化,当传播到外国以后肯定要发生变化,它必然要与当地的社会与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在异国文化中扎根。王蒙也持同样的观点。那么,我们今后应该如何对待儒学的翻译与传播中的这些异化问题?是纠正这些异化,还是任其自然发展?若需纠正,方法如何?新的传播手段应该怎样巩固和发展?我们将来如何更好地传播儒家思想?等等。这些问题都尚待研究。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近年来,国内外宗教哲学界以及翻译界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翻译与传播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关于儒家经典的翻译研究论著,我们收集到了论文 50 多篇,中外文相关研究著作 70 多部。

马祖毅^①和顾彝^②对《论语》、《中庸》、《大学》的海外版本进行了研究,指出了许多问题。例如,顾彝指出 1687 年在巴黎出版的《论语》的最早西文版,即拉丁文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该书的编者是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殷铎泽(Intorcetta)、恩理格(Hendtricht)、鲁日满(De Rougemont)和皈依的年轻中国教徒沈福宗。此书基本上是《论语》的完整译本,是在利玛窦选译本的基础上再经过至少 17 个不同国籍的耶稣会会士的研究和大量修订,最后才由柏应理等五人编著成书。再如,1688 版《论语》法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La Morale de Confu-*

① 马祖毅:《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45 页。

② 顾彝:“《论语》在海外的传播”,《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 年第 2 期。

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和 1691 年英文版《孔子的伦理: 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主和救星耶稣基督降生五百年以前就已达思想巅峰的中国哲学家, 其教导至今仍为中华民族奉为最佳人生指南》(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 事实上都不是翻译, 只是 1687 年利玛窦拉丁文版本的概要而已。尽管书中相当详细地论述了《中庸》和《大学》的基本内容, 但严重扭曲了原书的本来面貌。顾彝还指出了 19 世纪初新教传教士们在《论语》版本中把儒学与基督教教义混淆的情况, 如传教士学者麦华陀 (W. H. Medhurst) 于 1840 年完成的一个版本中, 把《旧约》和《新约》的段落插入到《论语》之中, 对其道德宗教意义加以阐发。

近十年来, 翻译研究界对儒家经典翻译进行了批评性研究。刘重德^①指出, 韦利的《论语》译文中值得商榷者有 45 条, 见仁见智者 41 条, 优劣互见者 19 条。何刚强^②对韦利《论语》译本的批评较为严厉, 认为由于“译者对先秦古文字在理解与解释上出现偏差, 没有能把握住原文原字实际所表达的事物或思想”, 结果“至少有二十六章完全译错, 即译文与原文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韦译全部错译与部分错译合起来占一百二十六章左右, 大约要占到整部《论语》篇章的百分之二十五。因此, 韦利《论语》的总体质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是太高”。程钢^③对理雅各和韦利译

① 刘重德: “《论语》韦利英译本之研究——兼议理雅各、刘殿爵英译本”, 《山东外语教学》2001 年第 2 期。

② 何刚强: “从 Arthur Waley 的译本悟《论语》的英译之道”, 《上海翻译》2005 年第 2 期。

③ 程钢: “理雅各与韦利《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的比较分析”, 《孔子研究》2002 年第 4 期。

本作比较研究,指出理雅各对《论语》的理解受到了中国宋明理学正统见解的影响;韦利则更多地受到了清儒的影响。他不赞成理雅各以宋明理学为依据的解释。柳存仁^①从训诂学角度批评西蒙·利斯(Simon Leys)译本的臆测之弊,指出“若多参前贤注疏,及不同时代论著之业绩,博闻而敏求之,则义理(思想)、考据(文字训诂)之功,可以思过半矣”。周发祥从由西及中、中西映衬、以西说中和中为西用四个方面评价了西蒙·利斯(Simon Leys)的译本,认为“利斯旁征博引、贯通中西的做法代表着西方汉学研究的一种深化。对西方读者而言,这样做可借近喻远、以易解难之便使他们得以容易地接触并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样做则使我们在同样得以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得以更深刻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其中包含了对利斯“旁征博引”,“借近喻远”,中为西用的做法的理解和宽容。这些批评都较客观地反映出了儒家经典翻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有一些翻译评论不够客观和中肯,对有些译本有过誉之嫌。例如,“以神通之,经之以思想,纬之以形态,这些译文有的犹如原著,语出警策,可资格言。虽为散文之体,实则于视觉上具诗词形式美,于听觉上擅诗之节律美”^②;“韦利的其他译作尚有许多缺憾,但所译《论语》却相当完美”^③;等等。可能与研究批评的角度较单一有关。

对于儒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近年来成果颇丰。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④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传播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中国艺术热潮,追本溯源,作了比

① 柳存仁:“百年来之英译《论语》其一——读西蒙·李斯译《论语》”,《国际汉学》1999年第4期。

② 陈飞亚:“简评理雅各英译《论语》”,《陕西中医函授》1999年第4期。

③ 柳士军:“Waley英译《论语》赏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④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较系统的研究。本书的第十章有两节内容涉及了 18 世纪《四书五经》的西译史，并对儒教和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关联作了分析研究。但这部分研究仅是整个交流史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已，由于全书在整体结构上比较宏观，这部分的研究仅限于 18 世纪的《四书五经》西译史，仅列出了殷铎泽、马若瑟、孙璋、宋君荣等几个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和著述简况。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①第二章从翻译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儒家各典籍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和翻译状况，包括译者身份、翻译年代、译本名称、翻译效果评述、译本传播情况等内容。本研究以宏观的翻译史研究为主要目标，并且对翻译过程和社会背景进行了描述，但因为本书以述史为主，所以对译本的具体内容，以及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几乎没有涉及，书中对某些译本的评价因此也不够客观。张西平的《他乡有夫子》和《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两部汉学研究论文集，书中收集了中国和欧美各国的汉学研究论文，注重对欧美汉学进行个案研究。从这部书可以了解到当代欧美汉学研究的基本路向和热点问题。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传教士评传》一书是对 18 世纪到 20 世纪来华传教士传教生涯的评传。本书主要介绍了这一时期包括马里逊、理雅各在内的主要传教士的生平，以及他们在我国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书中涉及 32 个传教士，跨时近 200 年。内容比较丰富。但关于有些传教士的研究资料略显单薄。尤其是对传教士的有关儒家思想传播活动没有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顾长声还翻译了《马礼逊回忆录》，虽然该书是一部译著，却相当于对马礼逊一生传教生涯深入的研究，富有研究资料价值。许明龙编著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从利玛窦到朗世宁》一书，对 23 名传教士的生平以

^① 马祖毅：《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